

·文献学·

# 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

曹 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秘书省是古代国家藏书的重要机构。本文论证了唐代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陈希烈、刘太真等人在秘书省的任职情况。

〔关键词〕 唐代 秘书省 职官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3)05-0025-03

唐代秘书省曾一度改名“兰台”或“麟台”，是唐代国家藏书的重要机构之一，号称“图书之府”。据《旧唐书·职官二》，其群僚成员及其分工如下：“秘书监一员，少监二员，丞一员。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为之贰，丞掌判省事。”秘书省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秘书监一人、秘书少监二人、秘书丞一人。秘书监相当今之国家图书馆馆长，负责全面工作；秘书少监相当今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协助秘书监进行日常管理；秘书丞相当今之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行政事务工作。唐代秘书省群僚可考者有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王方庆、王绍宗、周思茂、马怀素、徐坚、贺知章、陈希烈、颜真卿、蒋乂、阎朝隐、李益、刘太真、李随、柳仲郢等，兹择要略考如下：

令狐德棻(公元583~666年)，宜州华原人，唐初史学家。其父令狐熙为隋鸿胪少卿，世居敦煌，代为河西大族。令狐德棻博涉文史，早已知名。唐代建立之后，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先后担任起居舍人、秘书丞、秘书少监、礼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卒于家，终年84岁。令狐德棻一生两进秘书省，时间长达14年：第一次是在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至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担任秘书丞之职，历时10年；第二次是在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担任秘书少监之职，历时4年。令狐德棻对唐初秘书省的藏书建设和史书编撰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藏书建设方面，鉴于隋末战乱图书亡佚的严重局面，他在唐代第一次提出了大力购置、抄写图书的建议，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唐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没过几年，“群书略备”，国家藏书数量

大量增加，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唐初武德间，尚未组建史馆，图书编撰的任务仍由秘书省著作局承担。令狐德棻除了亲自参加类书《艺文类聚》的编撰工作外，还提出了编撰史书的重要建议：“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sup>〔1〕</sup>高祖然其奏，诏令他与萧瑀、颜师古、魏征、欧阳询、姚思廉等共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后因故未果。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复诏修撰，令狐德棻继续担任分修周史的任务，今传《周书》就是令狐德棻编撰的。令狐德棻关于官修诸史的奏章，在唐代图书编撰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sup>〔2〕</sup>。除了《周书》之外，令狐德棻后来还参与了《太宗实录》、《高宗实录》、《晋书》等的编撰工作，在官修《晋书》时，“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sup>〔3〕</sup>

魏征(公元580~643)，字玄成，馆陶人，唐代著名政治家。少孤贫，好读书。在隋末战乱中，历经坎坷，与世沉浮。唐代建立后，先后担任太子洗马、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太子太师等职，他以直言敢谏著称，号称净臣。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病死，终年64岁。魏征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担任秘书监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改任，历时5年。魏征非常重视图书的作用，他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sup>〔4〕</sup>魏征对秘书省的藏书建设和图书编撰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藏书建设方面，魏征作为秘书省的主要负责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校书、抄书活动。据《旧唐书·魏征传》：“以丧乱

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这次大规模校书活动,在唐代尚属首次,对唐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抄书活动规模也相当大,据《旧唐书·崔行功传》:“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讎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书手的选择也很严格,除了书法优秀之外,还必须是官宦子弟。在图书编撰方面,魏征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组织编撰了《群书治要》、《诸王善恶录》、《类礼》等书。《群书治要》五十卷,收录古籍 65 种,约取治国要言,以备劝诫。《诸王善恶录》收录古代诸王善恶得失,以教训子弟。《类礼》是整理戴圣《礼记》的产物,以类相从,并为注解。后来,《梁书》、《陈书》、《齐书》在姚思廉、李百药撰写的基础上,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sup>[5]</sup>

虞世南(公元 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人,著名书法家。自幼笃志勤学,曾师从著名学者顾野王,“精思不倦,或累旬不遑栉”<sup>[6]</sup>。还曾师从著名书法家智永,妙得其体,声名远播。他历仕隋、唐二朝,先后担任秘书郎、起居舍人、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深为太宗所推重,太宗称其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sup>[7]</sup>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卒,终年 81 岁。今传《北堂书钞》是他在隋代编撰的。虞世南于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到秘书省工作,先后担任著作郎、秘书少监之职,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继魏征之后,担任秘书监的职务,直到病卒,在秘书省工作时间长达 12 年之久。虞世南对秘书省的贡献主要在于继续组织校写群书的活动。据《旧唐书·崔行功传》:魏征调离秘书监后,唐太宗“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虞世南作为秘书省的主要负责人,从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到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病死,主持校书、抄书活动长达 6 年之久,校书、抄书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唐太宗的近臣,虞世南也以直言敢谏著称,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悲痛地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sup>[8]</sup>

颜师古(公元 581~645),名籀,字以行,祖籍琅玕人,祖父颜之推,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唐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他继承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历仕隋、唐二朝,先后担任安养尉、中书侍郎、散骑常侍、秘书少监、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职。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从驾东巡,病卒道中,终年 65 岁。颜师古一生在秘书省工作近 20 年,早在贞观初,他就在秘书省从事校刊《五经》的

工作,贞观七年(公元 624 年)正式担任秘书少监,协助秘书监虞世南主持工作。后因招聘人才时,收受贿赂,拟降为郴州刺史,太宗惜其才而未果。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升任秘书监,一直干到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病死。唐太宗《授颜师古秘书监制》云:“秘书望华,史官任重。选众而举,历代攸难。守秘书监颜师古体业淹和,器用详敏,学资流略,词兼典丽。职司图书,亟经岁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兹望实,可秘书监。”<sup>[9]</sup>可见秘书监的任命非常慎重。唐太宗认为颜师古学问渊博,“朱紫可辨,著述有成”,完全可以胜任校书、著书的工作;加上在秘书省工作多年,“职司图书,亟经岁序”,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才作出这样的决定。颜师古对秘书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校刊图书方面。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魏征调离秘书省后,唐太宗“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sup>[10]</sup>,作为秘书少监,颜师古亲自带头校勘《五经》、《汉书》等书。唐太宗贞观间,编撰《五经正义》,他是主要参加者,为了校定《五经》,他查阅了“晋宋已来古今本”,考证精审,力排众议。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十二月成书的《汉书注》,是历来《汉书》注解中最好的一种,被誉为班固之功臣。该书比较众本,审定音读,诠释字义,为古今学者所重。《匡谬正俗》八卷是颜师古考定群书文字的总结性著作,前四卷讨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讨论群书字义、字音及俗语之误。该书于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十二月八日由其子颜扬庭呈上,敕曰:“师古业综书林,誉高阁苑,讨论经史,多所匡心。”赐绢 50 匹。综观颜师古一生,虽为校勘名家,然其人品稍显不足,唐太宗曾责备他说:“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sup>[11]</sup>

马怀素(公元 659~718),字惟白,润州丹徒人,唐代著名学者。少时家贫无灯,燃薪夜读,遂博通经史,擢进士第。历仕左台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秘书监、昭文馆学士等职,开元六年(公元 718 年)卒,终年 60 岁。马怀素担任秘书监的时间约在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到开元六年(公元 718 年)病卒,历时 2 年。他对秘书省的重大贡献在于发起并组织了开元年间秘书省的图书编目工作。这次编目也是先整理后编目。开元初,“文籍盈漫,皆良朽蟬断,签牒纷舛”,唐玄宗“有诏句校秘书”,马怀素毛遂自荐说:“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繆缺。”<sup>[12]</sup>马怀素还进一步提出了图书编目的建议:“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澠。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

秘书。”<sup>[13]</sup>唐玄宗同意了马怀素的建议,任命马怀素担任秘书监的职务,并任命尹知章、王直、赵玄默、吴焯、韦述、马利征、刘彦直、宋辞玉、陆绍伯、李子钊、殷践猷、解崇质、余钦、王愬、刘仲丘、侯行果、袁晖、晁良、毋炆、王湾、郑良金等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内容分别编撰,秘书丞殷承业和武陟尉徐楚璧担任校勘文字的工作。秘书少监卢僔、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可惜马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sup>[14]</sup>,直到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病死,也没有编出来。马怀素死后,因为编目人员意见不一,到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仍然没有编出来。后来在唐玄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人员调整,辞去不合格人员,到开元八年(公元720年)《群书四录》终于编成。《群书四录》虽然不由马怀素亲手编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刘希烈,宋州人。博览群书,尤精玄学。继元行冲之后,深为玄宗所推重。玄宗凡有撰述,必请陈希烈修改。陈希烈历仕中书舍人、集贤学士、工部侍郎、门下侍郎、秘书少监、兵部尚书、左丞相、太子太师等职。安史之乱中,出任伪职。平叛后,赐死于家。他任秘书少监的时间约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之后,唐玄宗命陈希烈兼领秘书诏说:“国之载籍,政之本源,故藏于蓬山,絨以芸阁者,以为义府之代谟。三五以还,皆率兹道也。故每加购求,冀补逸遗,四部名目,悉索而来。《七略》条流,兼该颇尽。岂直羽陵之蠹简,汲冢之残编。如闻顷者以来,不存勾当,或铨次失序,或钩校涉疏,或擅取借人,或潜将入己,因循失旧,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资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尚书陈希烈充监秘书。”<sup>[15]</sup>诏令指出当时秘书省藏书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排列混乱;二是校勘粗略;三是随便借人;四是监守自盗,造成图书大量丢失。陈希烈上任后,必须解决上述问题。可惜因为文献无征,陈希烈所采用的具体措施已不得而知了。陈希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他的人品却有严重问题:安史之乱以前,与奸相李林甫打得火热;安史之乱以后,又投靠了安禄山,成为终生难以清洗的污点。

刘太真,宣州人。少时曾师从著名词人萧颖士,善属文,举进士,历仕起居郎、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秘书监、信州刺史等职。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赐宴曲江亭,帝自为诗,百僚唱和,太真诗列为上等。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刺史,不久即病死。刘太真担任秘书监的时间约在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之前。他在任职期间,曾有两次重要建议:第一次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七月,他上奏说:“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令所司陈设,及供食物,宰臣录其课效。”<sup>[16]</sup>唐德宗同意他

的建议。但是朝中不少人不同意这样做,原因是秘书省本来就有负责校书、正字的专职人员16人,另外聘任学者到秘书省从事校书工作,又要大量经费开支,是不合理的,结果没有办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八月,刘太真又上奏说:“准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已有到日,见欲就功。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其纸写书足日,即请停。又当司准格,楷书八年试优,今所补召,皆不情愿。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原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余钱,请添写史书。”德宗从其奏。”<sup>[17]</sup>这个奏章说明五个问题:(一)唐德宗重视文化建设。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到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一连三次对秘书省抄书事作出指示:第一次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八月二日;第二次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十四日;第三次是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正月十八日。(二)秘书省抄书数量很多。(三)抄书用纸因书而异,品种很多,其中麻纸和书状藤纸是专门用来抄写经书的。(四)抄写人员的选择十分慎重,规定“八年试优”。(五)校书、抄书钱粮由诸道分摊,这是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重要举措。从以上两个奏章可以看出秘书监刘太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以上我们重点介绍了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陈希烈、刘太真等在秘书省的任职情况。这些唐代的国家“图书馆长”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文化素质较高,个个都是学者型“馆长”。他们博览群书,精通古今,是当时的一流学者。第二,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他们在任职期间,或广求遗书,或组织校书,或组织抄书,或组织编目,或组织管理,为唐代国家藏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唐代至今已经千有余年,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唐代国家“图书馆长”们那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却没有过时,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 参考文献

- [1] [2][3]刘昫.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魏征.隋书卷32:经籍志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刘昫.旧唐书卷71:魏征传[M].
- [6] [7][8]刘昫.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M].
- [9]董浩等.全唐文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96.

(下转第50页)

数据库的构建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建立一个类名与主题词对应的基本框架,使每一类名下都对应一批主题词。第二阶段通过大量收录具有标引检索价值的关键词,建立起关键词与索引上的主题词的对应关系,利用主题词控制一个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主要是同一主题概念的各种表达形式。关键词的来源可以包括《汉语主题词表》原收录的非叙词、标引人员提供的关键词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印刷型及机读型同义词词典的词汇、用户检索策略用词及通过索引软件自动抽取的关键词等。

### 3.3 分类主题一体化检索的实现

#### 3.3.1 “关键词检索→分类限定”控制

“关键词检索→分类限定”控制就是用分类系统的知识范畴进行限定,把对某主题、某事物的关键词检索控制在一定的知识领域,即用特定的类限定关键词检索,从而排除不相关的信息,提高检准率。例如,检索“坦克”时把范围选定在“军事”内,就可以把玩具坦克、文艺作品中的坦克等不相关的信息过滤掉。

#### 3.3.2 “分类范畴→关键词检索”控制

“分类范畴→关键词检索”控制,就是在分类系统内进行关键词检索,把检索范围控制在一定的知识领域内,达到较精确检索的目的。例如查找有关球星“姚明”的信息,可先选择“体育”类目,再由“体育”类目进入“篮球”类目,然后在该类控制下进行关键词检索,可以大大提高检准率。目前少数搜索引擎具备这种由分类对关键词检索的控制。

#### 3.3.3 实现系统的扩检、缩检功能

通过关键词→主题词的对应,将检索提问式所使用的关键词转换成主题词,再转换成多个同义关键词进行扩检。还可以通过索引的分类范畴体系实现上、下位词的扩检、缩检。

### 参考文献

- [1] 张琪玉.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增强关键词检索功能的措施[J].图书馆杂志,2001,(1):7-10.
  - [2] 张琪玉.自然语言检索中各种因素对检索效率的影响[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7,(5):257-258.
  - [3] 张琪玉.分类语言、主题语言与自然语言一体化检索系统与《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的实践[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2,(1):66-67.
  - [4] 曹东,韩全惜,庄军.运用情报检索语言理论与方法完善搜索引擎的功能[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1):58-60.
  - [5] 潘艳.搜索引擎中情报检索语言的现状分析[J].现代情报,2001,(4):9-11.
  - [6] 赵英莉.联网环境中的情报检索语言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1998,(5):10-11.
  - [7] 曹玉霞.搜索引擎新思维[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5):33-34.
  - [8] 侯汉清.新闻信息数据库后控词表的设计和编制[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2):12-16.
  - [9] 王启云.如何利用搜索引擎检索网络信息[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1,(4):40-43.
  - [10] 夏立新.情报检索的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搜索引擎性能中的应用[J].情报科学,2001,(7):760-762.
  - [11] 张宇萌,马张华.利用篇名数据库自动完善后控词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3):79-80.
  - [12] 宾锋.信息检索的新方法——检索结果自动聚类[J].情报杂志,2002,(11):31-32.
  - [13] 俞君立,陈树年.文献分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 [14] 曹树金,罗春荣.信息组织的分类法与主题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 (收稿日期:2003-04-09;责任编辑:陈军)

(上接第27页)

- [10] 刘昫.旧唐书卷190:崔行功传[M].
  - [11] 刘昫.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M].
  - [1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9:马怀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 [14] 刘昫.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M].
  - [1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5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6] [17] 王溥.唐会要卷65:秘书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收稿日期:2003-06-05;责任编辑:王景发)